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图书馆 主办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LIBRARY



经管学科参考

2022 年第 5 期 总第 53 期

经管学科参考

2022 年第 5 期 · 总第 53 期

热点观察

印尼批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1
中国加入 DEPA 工作组正式成立·····	2
数字贸易驱动各国经贸合作热起来·····	3
中国数字贸易规模、顺差实现“双升”仍需加快对接高标准贸易规则·····	4
我国算力产业发展呈现三大趋势·····	6

学科前沿

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关系的理论创新·····	8
全球经济治理的逻辑·····	10
区块链：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抓手·····	11
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国家财富管理视角·····	13
构建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长效机制·····	14

经管资讯

《2022 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发布：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	17
前海“先行先试”将有助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7
去工业化引发西方社会未来焦虑·····	19
美国“芯片法案”扰乱全球供应链·····	21
中欧班列开创国际物流运输合作新局·····	24

印尼批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8月30日，印度尼西亚议会正式批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最终确定了印尼的成员国地位。

印尼贸易部表示，将立即通知东盟秘书处和其他缔约国。贸易部国际贸易谈判司负责人贾特米科·布里斯·维特亚克索诺进一步表示，在所有成员国收到通知60天后，RCEP将在印尼生效。

如果9月底可以完成通知，那么该协定将于2022年12月1日在印尼生效。

贾特米科表示，虽然RCEP是由印尼在2011年发起的，但印尼批准国际贸易协议的过程耗时较长。这是因为印尼批准立法分为多个阶段，且需要多轮来自专家的学术评估，贸易部不能减少流程。

RCEP成员国包括东盟10国以及中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新西兰。在东南亚7个国家以及澳大利亚、中国、日本和新西兰去年底批准后，该协议于今年1月1日正式生效。

印尼经济协调部长艾朗加·哈塔托表示，RCEP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集团，覆盖了全球约27%的贸易、全球29%的国内生产总值、全球30%的人口以及全球29%的对外直接投资。RCEP成员国是印尼的主要贸易和投资伙伴国，占出口总额1326亿美元的至少60%，占进口总额1306亿美元的71%。

艾朗加·哈塔托表示：“与印尼参加的其他贸易协定相比，RCEP具有许多优势。”第一，RCEP简化并为其成员国的贸易规则提供了确定性。第二，印尼将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获得区域价值链扩展与深化带来的优势。因此，印尼生产商可以从出口中获得更多附加值。第三，RCEP鼓励增加进入印尼的外国投资。随着营商环境的改善，印尼有机会进一步优化经济资源利用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第四，RCEP还包含其他几个重要特征，例如消除可能阻碍服务贸易的障碍，通过创建有利的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和提高使用数字化能力等方式支持中小微企业，提升保护知识产权执法水平，通过技术和经济合作缩小发展差距等。第五，RCEP还开辟了新的市场准入渠道，特别是为印尼农业和种植业、渔业、汽车和电子、食品和饮料以及化学和机械行业产品进入中国、日本和韩国市场提供了机遇。

艾朗加·哈塔托还表示，印尼将继续推动将RCEP秘书处设在雅加达，这在RCEP联委会第一次会议上也得到了支持。印尼方面认为，与该地区其他城市或国家相比，雅加达作为RCEP秘书处的所在地在运营、法律和外交以及政治方面具有优势。

作者：陈小方

来源：《经济日报》2022年9月1日第004版

中国加入 DEPA 工作组正式成立

根据《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联合委员会的决定，中国加入 DEPA 工作组于 8 月 18 日正式成立了，这是全面推进中国加入 DEPA 谈判的一个标志性节点。中国银行海南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李振认为，工作组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加入 DEPA 进程迈出实质性一步，也有利于中国更积极地参与全球数字经济规则的构建。

DEPA 是由新西兰、新加坡、智利于 2019 年 5 月发起，2020 年 6 月签署，2021 年生效的数字贸易协定，也是全球首份数字经济区域协定。2021 年 11 月 1 日，中国正式提出申请加入 DEPA，此后与 DEPA 成员国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开展了多轮次各层级对话。DEPA 联合委员会决定成立中国加入 DEPA 工作组，对中国加入 DEPA 进程而言程序性和实质性进展兼具，即已进入到正式谈判阶段。

数字化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根本趋势，也是国际合作的重要领域。当前，数字经济的国际规则体系正在构建当中，美国、欧盟、日本、中国、东盟等主要经济体均制定了有关数据保护和跨境流动的法律，双边和诸边自由贸易协定中涉及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的条款也不断增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均将“电子商务”作为独立章节。但也应看到，无论是各经济体的国内立法还是国际间的自贸协定，各自的原则、内容存在很大差异，全球数字经济规则体系仍处于酝酿、洽商之中。

DEPA 作为全球第一个单独的数字经济区域性协定，覆盖的领域更加全面，包含的内容更加前沿，采取的方式更加灵活，而且采用独特的“模块式协议”，参与方不需要同意 DEPA 所覆盖的 16 个模块的全部内容，而是可以选择其中部分模块进行缔约，体现了更大的包容性。中国加入 DEPA，既有利于中国对接国际先进规则，参与全球数字经济规则的构建，也有利于 DEPA 提升其全球影响力。

中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加入 DEPA 提供了坚实基础。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迅猛，数字经济规模及在 GDP 中的比重逐年增加，2021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45.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2%，占 GDP 比重达 39.8%。根据中国信通院的数据，2021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二，占全球 47 个主要经济体数字经济总量的 18.5%。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大、增速快、潜力大，为中国加入 DEPA 提供了坚实基础。

中国将加大数据有序开放试点力度。加入 DEPA 意味着更大力度的数据开放，需要坚持法治化基础，也需要加快试点探索。中国已经制定《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并在海南自由贸易港、上海临港新片区等开放前沿区域开展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扩大数据领域开放的试点，还特别提出在海南自贸港建设“智慧海南”，将海南打造成为全球自由贸易港智慧标杆。

作者：路虹

来源：《国际商报》2022 年 8 月 23 日第 004 版

数字贸易驱动各国经贸合作热起来

在全球已经进入以数字化生产力为主要标志的新阶段，数字贸易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各国经贸合作的新热点。

在 2022 年服贸会期间举办的“2022 数字贸易发展论坛”上，来自中国、印度、日本、菲律宾和德国等的业界代表，分享了各国的数字化发展趋势和投资机遇。

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刘作章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的重要性大大提升。许多国家已将数字贸易纳入本国发展战略，制定了很多开放性的政策和激励措施，而这些开放性措施有利于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国际间的经济合作。

中国产业基础雄厚，数字经济创新活跃，发展数字贸易具有明显优势。“‘十四五’期间，中国将进一步推动数字贸易发展，大力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积极开展数字贸易国际合作，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促进科技制度创新，加强与世界各国和地区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助力数字贸易发展合作，共享中国服务贸易技术成果，共创数字经济美好未来。”刘作章说。

海淀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企业协会理事长钟明博表示，中国数字贸易呈现出规模快速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国际合作不断深化的特点。展望未来，数字贸易的“中国力量”将更加凸显。

发展数字贸易，中国并非独行者。印度工商联合会执行董事阿都尔·达拉果地表示，印度正逐步成为数字经济前沿国家，已经建立了非常稳固的信息基础设施，以进一步弥合同发经济体之间的数字鸿沟。未来，印度会进一步发展数字农业、数字零售、数字物流，提升商业数字化思维和数字化能力，培育数字化人才，以实现对行业的数字赋能。“我们正处在经济发展的交叉口，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需要齐心协力来发展数字经济。”

“像中国一样，菲律宾也积极地参与到全球贸易数字化的发展当中，但竞争力并没有那么强。因此，我们在更多地寻求与中国企业在数字贸易方面开展合作。”菲律宾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洪福盛以游戏开发、动画制作和移动应用开发领域举例畅谈合作机遇。在游戏开发领域，菲律宾有专注计算机、游戏以及线上游戏的程序开发商和开发者，也有 3D、2D 等动画方面的人才，还可以提供后期服务包括游戏版本的英文翻译以及全球版测试、推广等，中国企业可以将这些领域的业务外包给菲律宾企业。

“未来，绿色城市的发展包括新能源汽车以及绿色出行是一个非常大的契机，这也是德国和中国企业都在专注的发展机会。”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驻华代表朱德威表示，希望“走出去”、走向德国的中国企业可以专注这个领域。在不远的未来，德国需要在 90 多万个家庭中安装家庭充电箱，还需要进一步推动自动驾驶技术发展，推动整个出行领域的变革。此外，德国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使得物流自动化需求增长。已经有一些中国企业在德国开展电商业务以及推广使用物流机器人。在远程医疗等方面，德国也需要进一步推动数字化发展和吸引更多的投资。

日本信息服务产业协会国际部会长川本淳说：“中国市场一直都是 JISA 会员企业一个

非常关键的市场，会员企业在中国建立了很多开发中心。希望中国的 IT 服务企业以及日本的 IT 服务企业能够进行更好的合作。”

本次论坛由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北京市海淀区商务局联合主办，北京市海淀区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企业协会承办。会议期间发布了“2022 海淀服务贸易重点企业”推介名单及“2022 海淀数字贸易企业典型案例”，旨在助力企业提升国际影响力，加快企业的“走出去”步伐。

作者：孟妮

来源：《国际商报》2022 年 9 月 13 日第 004 版

中国数字贸易规模、顺差实现“双升”

仍需加快对接高标准贸易规则

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迅猛，带动数字贸易蓬勃发展，为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实现经济贸易复苏提供了强大动力。

9 月 1 日，2022 年服贸会举行“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服务贸易开放发展新趋势”等多场高峰论坛，探讨数字贸易发展的新现象、新机遇。会上数据显示，2021 年中国数字服务进出口总值达至 3596.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3%，占服务进出口比重达 43.2%。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中国数字服务贸易额从 2018 年到 2021 年已连续 4 年实现顺差，并且差额不断扩大，2021 年，我国数字服务贸易顺差约为 300 亿美元。

而随着各国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的不断深入，全球数字贸易协定网络正织密加强，中国也正在主动对接高水平国际贸易规则，着力推动数字贸易领域的创新发展。

1 数字贸易顺差逐年扩大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 52982.7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6.1%；其中服务出口 25435 亿元，增长 31.4%；进口 27547.7 亿元，增长 4.8%。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在会上指出，目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基础日益牢固，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 50%，服务供给规模和质量稳步提升。而且在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下，内外贸一体化推动国内国际市场联动发展，为服务业走出去创造了良好条件。

随着中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以数据为生产要素、数字服务为核心、数字交付为特征的跨境数字服务贸易也正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会上发布的《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 2022》显示，2021 年中国数字服务进出口总值达至 3596.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3%，占服务进出口比重达 43.2%。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服务贸易的长期逆差，中国数字服务贸易额从 2018 年到 2021 年已连续 4 年实现顺差，而且数字服务出口增速显著高于进口。2021 年数字服务出口规模达 1948.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2%；数字服务进口规模达 1648.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罗雨泽在会上告诉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疫情使得数字技术的潜力和价值得到更深的认识，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加大数字化转型投入，新的数字服务消费需求大幅增多。在全球数字服务需求大幅增长的背景下，中国数字企业积极采用在线办公、在线会议等新生产和管理模式，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复工复产，提供了稳定的数字服务供给，强化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此外，中国数字贸易的规模扩张离不开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突破和广泛应用。信通院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6 月末，中国移动通信基站总数达 1035 万个，5G 基站占比 17.9%，2022 年二季度新建 5G 基站 29.5 万个；移动用户总数达 16.7 亿户，5G 用户占比 27.3%，2022 年二季度新增 5244 万户。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徐晓兰在会上表示，工信部接下来将按照适度超前的原则，继续加大 5G 网络和千兆光纤网络建设力度，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统筹布局绿色智能数据与计算设施，为数字贸易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数字底座。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数字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发展迅速，疫情期间，我国跨境电商发挥在线营销、在线交易、无接触交付等特点优势，在保订单、保市场、保份额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会上发布的《中国电子商务报告（2021）》显示，2021 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达到 1.9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6%，占进出口总额的 4.9%。其中，出口 1.39 万亿元，进口 0.53 万亿元。

而根据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在会上披露的数据，中国跨境电商今年上半年的表现更为突出，进出口同比增长 28.6%，是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速的近 3 倍，成为我国新的外贸增长点。

不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小涓提醒，我国数字企业、电商平台是数字经济中发展最活跃、最有竞争力的部分，但目前全球化程度还不够，未来要继续推进多元共治促进跨境电商健康可持续发展。

对于未来如何促进跨境电商发展，江小涓从治理角度给出五点建议，包括从数字跨国公司的角度来看待电商平台的重要作用、推动企业加强国际化运营合规管理体系的建设、鼓励商业平台和相关部门进行电商进口商业模式、监管模式以及相关体制机制的创新、允许更多的地方和企业试点数据跨境流动以及要尽快明确数字平台在海外经营的红绿灯规则设置，从而增强企业的信心和竞争力。

2 中国参与规则制定取得新进展

在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的同时，各国也亟需建立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制定相应规则，从而应对后续可能出现的仲裁、对接、税收等情况。

盛秋平在会上透露，近期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经合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联合工作组，会同相关国家修订完善数字贸易制度手册，明确了数字贸易包括数字并购贸易、数字交付贸易和数字中间平台赋能贸易，预计该手册将于今年底正式发布。

“新版数字贸易制度手册将有助于理清数字贸易的内涵和边界，推动各国加强数字贸易的政策研究，对开展国际比较分析和深度合作产生重要影响。”盛秋平说。

“数字贸易规则是目前最前沿的一个研究领域，当下还没有形成全球统一体系，中国目前在参与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方面主要是通过 RCEP、CPTPP 和 DEPA 三个平台来努力。”浙江大学副校长黄先海告诉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RCEP 已经成为中国目前在数字贸易领域数字规则方面最高承诺的体现。而中国又在去年申请加入了规则要求更高的 CPTPP 和规则涵盖面最广的 DEPA，将有助于进一步夯实自身在数字贸易治理领域中的影响力。

8 月 18 日，根据《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联合委员会的决定，中国加入 DEPA 工作组正式成立，全面推进中国加入 DEPA 的谈判。众多业界人士将此视为中国参与数字贸易规则建设的一个关键节点，是我国加快数字化发展，推进数字经济制度型开放的最新成果。

不过，黄先海提醒，中国在谈判中更关注数字贸易便利化和改善电子商务环境，这是因为其数字贸易优势主要来源于通过互联网平台发展形成的跨境电商，而对计算设施位置、通过电子方式跨境传播信息和争端解决等议题则较为淡化，未来可以立足中国自身特点，尝试在自贸试验区开展数据跨境流动便利化试点等举措。

“各国对数字贸易规则的具体规制安排仍存较大分歧，但对于规则制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根源已有相当程度的共识。”罗雨泽表示，后续要坚持利用多双边、诸边及区域等合作平台，就数字贸易治理开展平等对话和充分沟通，加快构建符合数字贸易发展需要的国际规则制度体系。

“鉴于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可能对维护公共政策目标带来多方面影响，有必要加强在更广覆盖、更加综合的机制平台上的磋商，如 G20、金砖合作机制等。”罗雨泽说。

作者：缴翼飞 赵子健 莫予滴

来源：《21 世纪经济报道》2022 年 9 月 2 日第 001 版

我国算力产业发展呈现三大趋势

作为数字经济时代新的生产力，算力正迅速发展。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底，我国在用数据中心机架总规模达到 520 万标准机架，算力总规模超过 140EFlops，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 30%，算力规模排名全球第二。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全面开启，算力作为重要‘底座’支撑、赋能作用日渐凸显。”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张云明 6 月 29 日在 2022 中国算力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新的生产力，将为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激活数据要素潜能以及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注入新动能。

1 我国算力产业链初步形成

目前，我国算力产业链已经初步形成，涵盖由设施、设备、软件供应商、网络运营商构成的上游产业，由基础电信企业、第三方数据中心服务商、云计算厂商构成的中游产业，由互联网企业、工业企业以及政府、金融、电力等各行业用户构成的下游产业。

张云明介绍，工业和信息化部着力构建以新一代信息通信网络为基础，以数据和算力设施为核心，以融合基础设施为重点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算力规划制定，加强算力核心技术攻关，促进算力资源供需对接，培育算力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取得积极成效。

目前，我国算力发展规划顺次出台，顶层设计逐步完善，算力设施建设有序推进，发展基础不断夯实，算力产业链条持续完善，算力赋能效应凸显。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和相关行业报告，2021 年我国互联网数据中心服务市场规模超过 1500 亿元，云计算市场规模超过 2000 亿元，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 4000 亿元。

地方也进一步展开布局。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山东省大数据局局长马越男表示，山东将进一步统筹数据中心一体化布局，加快建设一批数据中心核心区和集聚区，努力打造全国领先的数据中心资源高地。

2 我国算力产业发展呈现三大趋势

截至 2021 年底，全国在用超大型、大型数据中心超过 450 个，智算中心超过 20 个。

“我国算力技术创新不断提速，算力产业保持高速增长，算力规模持续快速提升，算力产业生态日渐完善。”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表示，目前，我国算力产业发展呈现三大趋势：一是算力形式更加多样，算力资源泛在分布；二是基础设施建设加速，算网融合持续深入；三是创新应用竞相涌现，产业生态日渐完善。

记者获悉，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算力产业。

在持续推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统筹布局绿色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推进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建设，加速打造数网协同、数云协同、云边协同、绿色智能的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实现算力水平的持续显著提升，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算力底座”。

在聚力推进核心关键技术攻关方面，充分发挥我国的体制优势和市场优势，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高端芯片、新型数据中心、超算等领域研发突破，加强先进计算、算网融合等技术布局，推动算力产业向高效、绿色方向发展。

在不断激发算力“引擎”赋能效应方面，深入挖掘算力在数字政府、工业互联网、车联网、金融科技等创新应用场景下的融合应用，提高算力在医疗、交通、教育等传统行业的应用水平，加快推进算力在更多生产生活场景的应用落地。

作者：李晓红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22 年 7 月 1 日第 004 版

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关系的理论创新

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和深化历程中，国际政治经济学不仅回应了国际关系现实出现的重大变革，而且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创新。

1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与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

20 世纪 30 年代，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一次大的理论论战，论战的双方是崛起的古典现实主义与传统的理想主义。然而，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期，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受到国际关系现实变革中一系列事件的挑战，这些事件使得美国霸权主导的战后世界经济以及与其相应的国际体系受到了挑战。相应的国际关系研究也开始关注经济要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国际政治经济学得以兴起。围绕着“霸权衰退”和世界政治经济变革，无论是现实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抑或是马克思主义者，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都加入到关于美国霸权是否衰退以及世界经济变革的研究之中。对于这些重大议题的研究，不仅催生了国际政治经济学，拓宽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野，而且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

2 “开放经济政治学”与理性主义的深化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冷战结束，尽管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论战，但在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经济稳定的背景下，研究者们将研究转向国内政治，他们围绕着“利益和制度”“国内和国际”的关联性，通过强化理性主义的分析工具，进一步深化国际关系研究中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美国学术界甚至提出了“开放经济政治学”（OEP）的分析框架，努力使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学化”。理性主义的深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向性研究议题之中。

第一，国内政治与国家利益偏好。与 20 世纪 70—80 年代国家中心主义“单一的”国家的假设不同，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自由贸易在全球的拓展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加速，导致与国家相关联的研究发生了两个方向性的转变：一是将国家理解为汇聚国内行为体（个人、行业或者利益集团）利益偏好的制度框架；二是讨论经济全球化是否改变以及如何改变一个国家的利益偏好以及制度调整。

第二，经济发展不平等。20 世纪 70—80 年代，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将经济发展不平等主要归因于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结构（核心与边缘、北方与南方），并认为“不等价交换”是经济发展不平等的主要原因。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以及昔日“边缘地区”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和“新兴经济体”，产生了两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一是全球化是否导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构本身的变化？二是民主化和国内政治改革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

第三，地区主义比较。20 世纪 60—70 年代的“地区主义”研究主要关注地区组织对推进地区相关国家之间的合作以及地区和平所起的作用。与此不同，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

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和亚洲区域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东盟成员国的扩展以及基于“东盟方式”建立的一系列地区机制，地区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问题上：一是为什么国家竞相在地区层面上合作？二是非国家要素的跨国流动在地区合作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三是地区主义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地区主义是全球化的垫脚石还是绊脚石？

第四，国际制度与国际谈判。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也研究国际制度，但研究者们关心的问题是，如果美国霸权衰退，国际合作是否仍然可能。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博弈论作为分析工具的引入，国际制度的设计成为首要议题。与此相关的问题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在国际谈判中，如何通过国际制度设计来满足成员国的目标。另一类是国际合作的分配问题，国际制度如何影响合作受益的讨价还价的过程以及结果。

3 全球政治经济变革与国际关系研究的新趋势

在反思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政治经济变革中，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这些趋势既关乎国际关系研究议题的设定，也触及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选择，还涉及学术共同体的建设。

第一，在研究议题上呼吁宏观大问题的回归。重拾认知分析的重要性，强调观念、文化和知识在利益认知和制度构建中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美国学派内部的学术争论上，特别是对“开放经济政治学”强调的“问题导向型”的批评上。这种趋势既体现在老一代学者诸如罗伯特·基欧汉、彼德·卡赞斯坦等对“开放经济政治学”的批评中，也体现在新一代学者所从事的具体研究议程中。这种对观念和文化的强调，其实是再次强调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互补性。

第二，在理论范式上趋向折中主义。重提价值判断的重要性，强调理论的目的性，这种趋势既体现在美国学术界对“开放经济政治学”的批评和反思中，也体现在英国学派和批判理论的复兴上。“开放经济政治学”假设政治结构和经济社会结构是中性的，因而主张寻求因果关系并从经验上进行证实或证伪。与“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假设不同，无论是批判理论还是英国学派都强调价值判断的重要性。所以，理论不是简单地理解世界的合作和冲突，而是要揭示那些自称是客观的分析判断究竟反映了哪些人的利益。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多元主义。重新评估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的作用，强调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并举，这种趋势既体现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分析和坚持批判理论的新一代学者的研究中，也体现在新一代“英国学派”的研究中。批判理论在方法论上反对基于个人主义的理性行为体模型，倡导对单个事件要根据不同的哲学前提和假设进行具体的分析和建构。英国学派则更强调通过制度分析和历史分析的路径，对系统性的变迁或社会发展进行研究。

总之，围绕着美国霸权衰退以及全球政治经济的变革，国际关系出现了新一轮的理论论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折中主义、中间路线甚至实用主义应运而生，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知识共同体，既不是美国式的，也不是英国式的，而是全球性的，国际关系研究进入多元化发展的新进程。唯有相互交流、借鉴，才能真正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

作者：王正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 年 8 月 11 日第 005 版

全球经济治理的逻辑

全球治理针对的是全球问题，后者指的是影响范围是全球的、问题的解决必须由世界各国携手共同实现的问题。全球经济治理主要指经济领域内的全球问题，其中最为关键或最具基础性的问题当属如何保持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包容、平衡地增长。在此，全球经济治理就是指世界各国如何通过协商达成一系列有助于维持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规则或制度。

一般地讲，导致生产率提高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创新与技术进步的扩散，二是基于分工和要素流动的贸易收益。技术进步导致生产率提高不难理解。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条件下，仅仅由于不同生产主体（这里主要指国家）依据自身优势进行分工与专业化生产，之后进行交易，便可提高参与分工和交易方的总产出，新增产出在经济学中被称为贸易收益。尽管在现实中这两个增长源泉深度交织融合，但在理论分析时将它们分开讨论则有助于我们对增长源泉的理解，进而为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政策与制度提供方便。这里集中讨论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如何最大化来自国家间分工和交换的贸易收益，从而助力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包容、平衡地增长目标。鉴于交换的基本前提是所交换对象的所有权得到切实保障、交换各方事前达成的契约受到保护，故贸易收益最大化问题大致可以转化成全球经济治理问题。具体说，全球经济治理处理的问题与人类经济活动相关，其行为主体主要是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其活动背景是世界政府的缺位，其表现形式为各行为体通过协商而形成的一组自我约束性规则或制度。

当今世界，全球经济治理涉及领域诸多，主要包括左右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换、影响生产要素与资本跨境流动的国际贸易投资和货币金融制度。与全球经济治理密切相关的议题还涉及供应链、价值链、大宗商品供求、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以及主要行为体之间的政策协调。上述全球经济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然而，当今世界在处理全球经济问题过程中仍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治理赤字。因此，如何压减并最终消除全球经济治理赤字便成为人类面临的一个“更高维度的”全球问题。对全人类福祉改进有利的事之所以难，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共同利益并非形成集体行动的充分条件。具体到全球治理，问题便是治理成本如何分摊、治理收益如何分享。在经济学里这就是所谓的集体行动难题：由于集体行动的成果享用不排他，集体中的成员便会努力去搭便车。这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公共产品提供明显不足，二是以国际制度为表现的全球经济治理通常带有明显的非中性特征，亦即同样的治理对不同行为体意味着不同的结果，有些受益，有些则受损。

如果把大国间的地缘政治经济竞争考虑进来，那么互利共赢，至少是帕累托改进的自由贸易也是不可接受的。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 2004 年发表的《李嘉图和穆勒在什么地方反驳或证实了支持全球化的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一文中指出，颂扬自由贸易的李嘉图—穆勒模型在不考虑技术进步时是成立的，但将技术进步纳入分析后则该模型可能会出问题。萨缪尔森以美中两国为例论证说，如果中国的生产率提高到使两国在生产两种产品时生产率之比完全相等的水平，则它们各自的比较优势便消失了，两国又回到自给自足状态。由于技术进步，中国的人均收入得到提升，最终结果是美国实际人均收入遭受到持久损害。

在暂时不考虑大国间地缘政治博弈前提下，解决全球经济治理过程中集体行动难题的思路之一，是考虑有效治理的机制设计。全球经济治理需要各个国家行为体通过平等协商，在充分考虑到各成员所负担成本与所分享收益的平衡后，逐步形成被各成员接受的多边规则。

在机制设计过程中，关键是要通过提供相容激励来减少或消除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通过创造选择性激励以降低或杜绝搭便车行为。治理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各国可以根据紧迫性、严重性、可行性等对全球经济问题进行排序，按轻重缓急分步施策。如果一时难以达成共识，可以考虑化整为零，把一揽子议题分成若干模块加以处理。

自由贸易带来的互利共赢并非让所有受益国满意。1850年后制造业霸主的权杖就逐步转移到了美国。因此，在大国间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不惜牺牲自身利益也要遏制对手的赶超势头成为其主导策略，结果便是全球体系分裂或出现两个或多个往来受限的平行体系，最终导致全球统一市场的萎缩和随之而来的全球贸易收益缩减。防止出现这一全球福利水平下降可以多管齐下：首先是恢复或建立大国间的信任；其次是挖掘和用足非经贸领域的交汇利益以提升脱钩成本；再次是最大化平行体系间不受限往来带来的贸易收益；最后是强化与中等强国及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贸合作。

作者：张宇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9月1日第008版

区块链：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抓手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如何建立一个全球高度可信任机制，较好地包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与目标，形成关于全球经济治理标准的共识，是一大难点。作为一种新型基础设施，包容性和去信用化是区块链的最大特点。通过构建具备高度互操作性与可靠性的数据处理平台，区块链或将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一种堪称“革命性”的技术解决方案。

首先，区块链可成为支撑全球经济治理的关键基础设施。由于当前不同政府部门、多边组织和跨国公司数据各成体系，有必要将这些数据在区块链底层链接成统一整体，进而支撑跨国别、跨区域的多边项目发展计划，在去中心化应用层开展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各类实践，如《巴黎协定》中的国家自主贡献交易、跨国基础设施建设服务、跨国标准和报告体系建设、多边共识协议签署修订等，由此建立起全球性的跨国平台。在分布式记账技术支持下，各类商业资产和项目将被分配不可篡改的ID标签，并与信息系统和监管服务无缝连接。各类群体均可将信息上传至该平台进行处理，成为分布式记账中的节点所有者，并对上传数据负责。区块链可提供不可篡改、可经审计的有效数据保障，而数据流动的高透明度与匿名性确保数据所有者能够有效管理交易流程，且无需担心数据的隐私问题。

其次，区块链可在包容多边的同时开展合规监管。区块链能够时刻监控项目的合规性，确保系统在“海纳百川”的同时做到“正规有序”。根据不同行业的技术标准，区块链可追溯项目数据是否合规，特别适用于需要定期上报数据的公共设施所有者或运营商。对于违反规则的行为，可在区块链网络中设定罚款、征税、限制交易等惩罚措施，并对此规则予以清晰描述，确保执行有理有据。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区块链可将智能契约、物联网设备等嵌入到流程的不同阶段，从而赋予监管更高的一体化与自动化水平。例如，对地方空气质量监测站而言，其需要定期对空气数据质量进行识别和分析。通过传感器自动记录并传输空气质量数据，在区块链系统的自动化监测服务下，来自不合规空气质量监测点的数据及其负责部门

将会被标记出来，上报给环境监管机构。一旦数据被记录上链后，自动化的智能上报与监管服务体系将会开始运转，把卫星影像、远程物联网传感器、工程报告及管理报告中的数据资源打包上传。官方机构将会对这些数据进行追溯，并根据区块链系统建立的环境保护、公共治理与反腐败标准，审查企业污染处理、环保部门监管过程中是否存在违规行为。

再次，区块链可推动大范围多边协议的有效执行。区块链可用于大范围多边协议（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多边贸易协定等），以此提高协议执行效率与流程的透明度。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例，《巴黎协定》建立了“承诺+评审”的国家自主贡献合作模式，缔约方需提交各自国家自主贡献的信息和核算规则，并可就国家间的国家自主贡献转移交易进行协商。区块链技术可对这种跨区域的广范围协议进行审核监测，跟踪国家自主贡献的资金流向。区块链的高透明度与不可篡改性将显著提升伪造交易的难度，并借助错配资金的手段，对企业或政府的寻租行为进行严格限制。通过这些技术方案，各国为应对气候变化涉及的投资、研发、碳排放审计等协议内容将得到更好落实，汇报标准和流程将更为规范，特定部门所需的报告数据也可依托区块链的数据追溯功能自动生成，确保建立稳健的碳排放核算体系。

最后，区块链可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重要支撑。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的每一阶段都需各参与方达成信任关系，但这种信任关系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较为棘手。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情况较为复杂，难以开展集贸易、投资与民心交流为一体的深度合作。此外，“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还存在不同程度的数据不够透明、财务难以审计、流程互操作性较差等问题。区块链可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有力武器。区块链有助于构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合作平台，实现整个建设流程“链化”。所有价值链上的参与方均要求在节点及时上传合规有效的数据，并由系统自动监督审查，以此建立去信任化的管理体系。通过项目参与方提供的真实、规范和及时的信息，决策者能够在项目规划、融资、认证等方面进行准确度量。此外，区块链的数据追溯功能有助于更好地规划、分配并跟踪投资及资金流动情况，以此合理制定相关政策和部门预算，提高资金使用绩效。

基于上述分析，可将区块链作为助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重要手段，充分发挥其技术优势与效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基础。

第一，借助区块链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区块链技术实现的数据互信、价值互通和权益共享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技术层面的应用和表达。因此，在区块链平台的建设过程中，不仅要突出其去中心化、开放、共享等功能，还应积极传递其蕴含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与全球治理观等，让“上链”的企业与个人深刻感受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与意义，促进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文化语言互通。我国可为发展中国家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获得成熟区块链技术和适用技术、提升与区块链技术相适应的劳动者技能等方面提供更多支持，发挥我国相关产业优势，推动全球经济社会朝着更具包容性的方向发展。

第二，依托区块链推进全球多边组织改革。当前，“逆全球化”暗流与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叠加，导致国家间竞争格局重塑、个体经济利益重配、民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现有的全球多边组织规则面临严峻挑战。我国在坚定维护和发展多边主义的过程中，可依托区块链推进全球多边组织改革。例如，将区块链技术融入WTO改革过程，使传统纷繁复杂的贸易文书数字化上链，以此促进贸易便利化，提高贸易效率。通过建立区块链贸易平台，在贸易融资、清关、运输、后勤等领域，增强各成员国间的互信，提高供应链透明度。发挥区块链的数据不可篡改与可审查特征，改善贸易融资操作规则，以此更加有效和透明地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区块链技术有助于改进贸易融资、海关监管、认证程序、保险营销、知识产权保

护和政府采购等领域存在的不足，推动 WTO 朝着更加符合公平竞争原则的方向，以及更加有利于经济创新发展和全球包容性发展的方向改革调整。

第三，通过多边机构加速全球区块链平台建设。作为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载体和多边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不仅填补了“一带一路”建设的资金缺口，还通过提供成熟优质的金融服务，提高亚洲资本的利用效率，同时吸引全球资本。因此，可尝试由亚投行牵头，联合各国主要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建筑公司、设施材料供应商等，构建跨国别、跨区域的区块链平台，将其作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规划、融资、审查、跟踪等业务开展的主要阵地，以此改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流程。可先在一些小型基础设施项目工程上展开试点，随后再逐步向更多项目推广。充分利用区块链的技术优势，发挥亚投行在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项目上的推进作用，将有助于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良好的信任机制，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活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我国绿色发展的产业支撑问题研究”（17CGL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渠慎宁（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 年 8 月 24 日第 003 版

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国家财富管理视角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背后是国家财富管理体制从国家全面掌控社会财富到合理利用社会财富的过程。国家财富管理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独特视角。现代化进程离不开财力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更是离不开国家财力支持。没有财富支持的现代化是不可持续的，没有持久财力支持的现代化持续不久。正是内源融资型的国家财力集中，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初始资金，由此形成集中型的国家财富管理模式。

国家财富管理模式并非一劳永逸，而是为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而不断演变。触发模式演变的条件主要是社会财富创造的可持续性遇到挑战。国家的力量大小不在于国家直接支配的财富多少，而在于可以调动财富的多少，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这些财富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从直接支配的财富数量来看，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支配的财富占比历经先变小，后根据实际需要再实际优化的过程。

国家财富管理是一门技术。技术的专业性决定财富利用效率的高低。社会分工的复杂化决定了粗放式的国家财富管理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财富管理模式从而转向涵盖更多参与者且更加专业的国家财富治理模式，并在演变中实现治理现代化。国家直接支配财富的管理效率在演变中得到提升，并突出表现为预算能力的提升。预算能力的提升既涉及预算制度改革，又与预算技术革新有关，有助于提高国家直接支配的财富管理效率，从而为现代化提供更充分的财力保障。

为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国家财富管理从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从包揽一切转型为为国家现代化提供财力支持，但实现国家富强的中心目标未曾改变。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主线是不

断挖掘内部资源，释放经济潜力，同时注意协调内外资源，让中国现代化进程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融为一体。与此相适应，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经济主体历经再造，进而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适应国家财富管理模式的转变，企业会计信息管理首先作出相应变革，从具体的行业会计制度到会计准则体系，市场主体信息传递渠道和机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新的国家财富管理模式提供了信息支持。其次，市场交易的增多要求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作出相应变革，SNA 取代 MPS 是根本性变化，同时还需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继续调整。再次，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也要求适应工业社会的会计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作出相应改革，为国家财富管理提供强有力的决策信息支持。最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要求宏观经济稳定实现机制作出相应变化，加上应对特定时期重大问题的挑战，宏观经济稳定目标、手段、机制均发生明显变化，推动着中国国家财富管理新模式的形成。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合适的国家财富管理模式下进行的。中国正是立足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实国情，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国家财富管理体制，并在统筹政府财力、动员社会资源上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中国国家财富管理体制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优化，对内改革积累实践经验知识，对外开放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进而促进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这种知识支持型的中国国家财富管理模式的变革是中国道路的一个缩影，梳理其中的案例可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重要参考。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变迁，就是其中一个突出案例。这并非是某个理论模式的简单套用，而是在吸收人类文明共同财富的基础上，融入了中国智慧，从而走出了独具特色的中国道路，形成了适应中国需要的国家财富管理新模式。

作者：杨志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 年 8 月 31 日第 004 版

构建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长效机制

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第一驱动力，中国信通院测算 2020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占 GDP 比重高达 38.6%，但数据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并未有效建立。构建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长效机制，要不断健全和完善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体制机制，构建和完善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市场支撑体系，探索和确立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具体形式和典型模式等路径。

1 发展现状

数据要素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性和战略性生产要素，是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广泛深入应用，以及不同生产要素协同效应优化，促进了国民经济运行效率显著提升，经济增长倍增效应明显。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前提是数据要素的价值化。

数据要素的价值由凝结在数据要素里的数字劳动决定，具体数字劳动和抽象数字劳动分别决定数据要素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数据要素价值化实现要求必须在数据要素市场完成商品化的关键一环。

以数据技术为引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看清社会发展变化的趋势，抓住社会变革的契机，把握更好的发展机遇。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数字经济时代，技术、标准更新迭代的速度远超以往任何时期，创造性毁灭的潜在风险进一步凸显，导致一些数字化信息和知识产品无法完成从产品向商品的转化，从而沦为数字垃圾。这些无效数字劳动由于价值不能市场化实现，难以进入收入分配环节。同时，由于发展和技术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数据要素在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人群中配置失衡，引发数字鸿沟。数据要素极化配置可能加大收入分配风险，还会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社会包容性发展。拥有数智技术的数量、质量和结构差异，导致大量非数字劳动从业人员和数智技术落伍的数字劳动从业人员很容易被数智技术替代，引发了对就业问题的进一步担忧。保障所有群体共享数字经济增长的福利和红利，才能体现数字经济发展的合理性和公平正义。

2 构建原则

构建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长效机制要以社会福利最大化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坚持创新引领、效率优先、共享发展、模式优化的构建原则。

创新引领。数字经济的生命力和动力源自持续创新，创新引领下的数字经济发展是做大做优经济蛋糕的源泉和动力，收入分配机制应正向激励有效数字劳动，激励数字技术及运营理念、模式不断创新，引导数字经济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从而最大化推动数据要素的价值创造及价值实现。

效率优先。在当前数字经济的成长期及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期内，数据要素的初次分配环节，必须坚持效率优先的市场化分配导向，让提供高质量数字劳动的经营者、劳动者及数据要素投资者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多劳多得，优劳优得，坚决摒弃平均主义分配倾向，充分激活市场主体创造价值的动力。

共享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共享发展理念，但共享不是均享。数字经济时代全民应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共享形式应通过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环节实现，再分配机制不能影响数字经济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提供高质量数字劳动和贡献的数字精英及劳动者应享有更多份额。模式优化。在不同的市场与政府关系、分配实施环节、分配主体主导、所有权特征态势下，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模式体现和具体实施有明显差异。如市场主导型、政府主导型所对应的收入分配机制在效率和公平正义上有显著差异；所有权特征下收入分配机制应体现出市场原则和社会契约的和谐统一。不同分配模式适用于不同的分配场景，模式演变具有政策性、时代性、动态性、自我优化性。

3 实现路径

健全和完善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体制机制。首先，要制定《数据要素市场发展规划（2022—2027年）》，通过规划的实施引起各级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从而消除阻碍数据要素市场发展的各种体制机制因素。其次，以政务数据公开为导向激活数据要素市场。要打破制度性数据孤岛，改变公共数据的“行政部门所有制”，建立互联共享的公共数据应用系统，尽可能及时全面地向社会和市场开放，引导企业数据加快入市以激活数据

要素市场。再次，立法推动数据要素交易的市场化、规范化和透明化。应完善数据要素市场运行与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消除数字垄断和非法数据要素交易现象，形成可信的数据要素市场交易秩序和规则，从而合理合规实现高质量数字劳动价值。最后，要健全和完善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法律法规体系，要立法保障数据要素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各个环节、各个主体的合法利益。初次分配环节坚持效率优先、正向激励，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环节应利用税收调节和政策导向实现数字经济发展成果的包容共享。

构建和完善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市场支撑体系。首先，健全和完善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建设，夯实数字劳动和数据要素价值实现的市场基础。要构建全国统一、功能齐全、成熟高效的数据要素市场，不仅要完善各项规章制度等软环境和支撑数据要素市场化流动的数据基础设施等硬环境建设，还要完善国内数据要素市场化流动循环并积极参与国际要素市场流动的大循环。其次，加强数据确权和数据要素价值评估问题研究。要以市场化为导向，构建科学、开放、动态的数据产权体系，数据确权导向以激励数字经济发展和数据要素价值创造为主旋律。要进一步加强数据要素价值评估和分配问题研究，探讨对数据资产和价值及收益进行确认的理论与方法。最后，加强和完善新型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数据资源转化为数据要素和数据资本需要新型数据基础设施的支撑和支持，在支持数据要素市场化流动的新型数据基础设施存在短板的情况下，盲目进行数据要素价值市场化实现不切实际。要构建可持续的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支持机制，以政府资金为先导，撬动民间资本投入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公私合作的、可持续的资金投入支持机制，是数据要素价值市场化实现并参与收入分配的关键。

探索和确立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具体形式和典型模式。有效的数字劳动生产数据要素价值，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权利必须以数字劳动的有效性和市场认可为前提。从事数字要素生产和配套服务的数字劳动者在获取常规的工资和绩效奖励之外，还可以通过基于高质量数字劳动的收入分配形式获得报酬。短期而言，工资和经营绩效奖励具有较强的激励作用；中长期而言，完善高质量数字劳动者的价值认可和实现机制更具激励作用。国家层面要完善数字劳动贡献的支持政策及制度，包括数字税收支持、数字人才津贴、数字技术科技奖励等；企业层面要完善数字资本收益分配、数字技术入股、数字人才持股计划、期股期权制等。

在上述具体形式基础上，逐步由市场确立和优化数据要素所有权主导下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典型模式。在劳动者占有模式下，劳动者根据数字劳动贡献共同分享数据要素收益；在数字投资者占有模式下，数字投资者享有数据要素收益索取权和分配权；在数字劳动者和投资者共享模式下，数字劳动者将根据数字劳动的质量和实际贡献与投资者分享收益；在数据要素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模式下，数字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数字资本经营者获得经营绩效，数字投资者则获得剩余收益，收入分配份额取决于契约和经营绩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机制与策略研究”（20ZDA04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数字经济时代超级网络平台的相关市场界定研究：理论与实证”（71863012）阶段性成果）

作者：杨飞虎（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占佳（江西财经大学协同创新中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6月22日第003版

《2022 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发布：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

财政部近日发布的《2022 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上半年财政部门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要求，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合理安排债务规模，保证财政支出强度，优化支出重点和结构，推动财力下沉，持续改善民生，对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发挥了积极作用。

根据《报告》，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1—2 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10.5%。3 月受国内外错综复杂形势、疫情等影响，当月收入增速同比回落至 3.4%。4、5 月，叠加集中实施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等影响，财政收入有所下滑。随着疫情逐步好转、稳经济政策效应进一步显现，6 月财政收入企稳回升，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5.3%，增幅由负转正。

上半年，税务部门坚持阶段性措施和制度性安排相结合，新增退税减税降费 5074 亿元、办理退税 18455 亿元，切实为市场主体减负纾困，有效提振市场主体信心，增强发展内生动力。财政部门做深做细专项债券项目储备，用好用足专项债券作为重大项目资本金政策，优化专项债券投向领域，扩大有效投资。1—6 月，各地累计发行新增专项债券 3.41 万亿元，基本完成发行任务。

作者：曲哲涵

来源：《人民日报》2022 年 8 月 31 日第 013 版

前海“先行先试”将有助港澳更好融入 国家发展大局

一年前的 9 月 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简称《前海方案》）正式发布。《前海方案》提出，到 2025 年，建立健全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初步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营商环境，高端要素集聚、辐射

作用突出的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多轮驱动的创新体系成效突出，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引擎作用日益彰显。前海合作区不仅在地理面积上扩容，一系列新政策也为打造良好的综合环境带来重大利好。日前，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专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所长曹晋丽。

1 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提供坚实根基

南方财经：你如何看待前海的这些先行先试的探索，对前海加快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有怎样的意义？

曹晋丽：这些先行先试探索，是加快建设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支持香港经济社会发展、提升粤港澳合作水平的重要举措。一方面，有助于内地在更好融入全球市场体系方面先行先试，助力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另一方面，为内地与港澳更紧密合作提供示范，对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提供更好试验平台。

南方财经：《前海方案》逾一半条文关于深港两地的规则衔接以及机制创新。对此，前海应该如何进一步优化深港两地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衔接？

曹晋丽：前海合作区可考虑以内地与香港、澳门共建单一自贸区为契机，研究推出进一步开放措施。一是进一步推进投资便利化，落实 CEPA 协议，推动在金融、法律及争议解决、电信、中医药、建筑等领域对港澳实施特别开放措施，便利港澳专业人士及企业投资享受国民待遇。二是加快提升与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率先研究推进制定与国际接轨的服务业标准化体系，便利相关专业人员跨境执业。三是进一步促进人员货物往来便利化，例如研究推出更加便利的签注安排，加强与港澳口岸部门协作、依法推动更加便利的通关模式。四是对标 CPTPP、DEPA 等，在数据跨境流动、数字贸易规则、标准、管理、规制等领域积极探索实践。五是进一步推动金融创新。

2 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营商环境

南方财经：《前海方案》提出推进与港澳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你怎么看未来前海的制度创新空间？

曹晋丽：围绕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定位和发展目标，未来制度创新可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围绕加快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对标 CPTPP 等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搭建高水平开放平台等方面先行先试。二是继续推进与港澳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推动科技研发、现代服务业发展、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等体制机制创新，通过畅通要素便捷流动，持续获得经济增长动能，打造协同协调发展新模式。三是创新合作区治理模式，积极衔接北部都会区建设，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助力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探索新路径。

南方财经：《前海方案》对香港进一步融入国内大循环和发挥国内国际双循环桥梁作用，有哪些重要意义？

曹晋丽：一是对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意义重大。前海扩区后，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和生产性服务业支撑体系打造，有助于更好对接北部都会区发展战略，通过制度创新合作，充分发挥深港科研、创新产业链优势互补，形成两个重要发展极，从而为香港持续获得增长动能提供有力支持。二是有助于更好发挥香港连接内地同世界的重要桥梁和窗口作

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不断构建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三是《前海方案》在破除市场壁垒、促进公平竞争方面的先行先试，不仅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积累宝贵经验，同时也为香港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依托、深度融入国内大循环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南方财经：《前海方案》提出，2025 年前海要初步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营商环境。前海还可以在哪些方面继续发力？

曹晋丽：德勤中国去年 12 月发布《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2020-2021 年度营商环境蓝皮书》，通过 13 个维度综合评价，认为前海合作区已跻身全球营商环境第一梯队，接近世界一流水平。未来，一方面，前海合作区可以继续对标香港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另一方面，世界银行 2022 年 2 月发布新一轮营商环境评估指标体系草案，拟包括 10 个维度指标，主要是围绕监管框架、公共服务和实践效率进行评价，需密切关注新变化。我认为，结合《前海方案》，可能的发力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加快推进前海合作区投资者保护条例研究制定工作，充分借鉴 3 月 1 日起实施的《广东省外商投资权益保护条例》和最新修订的《江苏省保护和促进香港澳门投资条例》等的经验；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标 CPTPP，探索试点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竞争政策框架，推进信用经济试验区；加快建设国际法律服务中心和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助力香港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加强电子证照、数字身份认证等先进做法，提高公共服务效率等。

作者：吴治聪

来源：《21 世纪经济报道》2022 年 9 月 6 日第 007 版

去工业化引发西方社会未来焦虑

自 20 世纪后半叶起，特别是近 50 年以来，制造业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中的比重降低。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引发了人们深深的担忧，但似乎也带来了迎接经济发展新机会的希望，有关经济结构从工业向服务业转型的预测由此成为持续性的争议话题。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研究所经济社会学高级研究员蒂穆尔·厄尔根（Timur Ergen）近期在研究所官网发表文章《去工业化的事实与虚构》，回顾了西方社会关于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的公共讨论，以了解社会权力结构和意见冲突对未来情景预测的影响。

1 去工业化令人喜忧参半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制造活动被认为将走向终结。当时一种流行的看法是，未被外包至劳动力成本较低国家的产业都将逐渐实现自动化，直到西方后工业社会缓慢地形成。但从 21 世纪初起，许多学者将去工业化与西方社会的多种问题联系在一起，例如，右翼政治势力在英国和美国崛起、地区差距扩大、收入不平等上升、生产率增速下降、气候政策遭遇政治阻碍。可以说，去工业化及其造成的冲击被视为威胁资本主义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因。

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发生前，经济结构转型在西方发达国家被视为完全积极的，甚至被

当作某种后资本主义乌托邦。在这一愿景中，从田野劳动到机械化生产再到计算机编程，可以视为顺势而为的结构转型，制造业的衰落反而将有助于缓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和资源匮乏。然而，站在当下回望历史，我们会发现，这是一种非常天真的“进步”观念，德国拜罗伊特大学经济与社会史教授扬-奥特马尔·黑塞（Jan-Otmar Hesse）将其称为“现代化理论中生代的恐龙”。

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众对经济结构转型既抱有深切的希望，也怀有深刻的恐惧，这使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具有高度政治争议性的未来情景。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每一场贸易冲突中，面临威胁的产业都试图宣称自己对“本国制造业的未来不可或缺”；在资本主义社会每一次重大经济政策改革中，改革倡导者都为短期内即将腾飞并造福人民的“现代”工业大唱赞歌。以去工业化为中心的悲观绝望叙事或对更新换代的许诺，都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与未来展望有关的社会争议。对真实经历和科学观察结果的不同解读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关于“后工业社会”定义的政治经济争论，是资本主义社会面对未来的典型反应。

2 后工业时代结构转型更复杂

20 世纪上半叶，来自新西兰、英国、法国的三位经济学家——艾伦·费舍尔（Allan Fisher）、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和让·富拉斯蒂埃（Jean Fourastié）创立了三次产业分类法（three-sector model），将经济分为第一产业（农业、林业、渔业、畜牧业）、第二产业（加工业、制造业、建筑业）、第三产业（服务业）。这一分类方法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采纳，为结构转型理论（structural change theory）奠定了基础。根据结构转型理论，经济重心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转移是一种良性发展，因为结构转型常伴随着生产率提高，以及人们生活质量、受教育程度和劳动技能的提升；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应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

不过，三次产业分类法有其局限性。历史上，许多国家的发展轨迹时而偏离上述“三段式”。例如，日本经历过劳动力集中于农业的漫长时期；美国工业化高峰时期服务业出现冗员；近几十年里，德国工业就业人数保持稳定。而且，三次产业分类法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框架，但社会现实却复杂得多，许多经济活动是相互交织的——机械制造企业的财务部门是否属于服务业？现代农业产业链上的研发、储运、销售等环节各属于哪个产业？在许多学者看来，三次产业分类法难以准确描述 21 世纪的经济，后工业时代的结构转型可能不存在简单模式。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社会科学界常见的一种观点是，富裕国家制造业对创造就业和附加值的重要性在缓慢但稳定地下降，主要原因是消费模式变化、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制造业生产率增长。但是，这不意味着制造业将快速消亡。从 19 世纪至今，特定企业、行业、地区、产业集群的兴衰更替并不罕见。中期内，经济部门之间和部门内部的置换（displacement）与开创性的结构转型不可同日而语。

3 去工业化被“社会建构”

若想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去工业化的社会性反应，仅考虑关于结构转型的经济学理论还不够。当一个地区在短短几年内流失了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时，人们自然感到去工业化是一种剧烈的颠覆。这种颠覆常常塑造了预测工业社会未来时的社会环境，且会影响到政治经济争论。将后工业转变视作关于未来的社会建构概念并追踪其轨迹，有助于了解社会预期（social

expectation) 的形成动态。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企业税 (corporate tax) 的政策变化就是一个例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经合组织成员的资本密集型企业普遍享受到税收优惠待遇。1981 年, 美国政府通过了减税力度极大的《经济复苏税收法案》, 旨在鼓励挣扎中的制造业再投资, 刺激经济增长。1986 年, 美国政府终止了对资本密集型企业的税收优惠, 相当于与强大的制造业利益集团公开反目。驱动这一决裂的是一个由小企业、工业人口数量少且分散的州、认为“美国社会困于过时的工业结构”的专家组成的新联盟。由此, 去工业化从对传统工业的威胁变为未来发展趋势。

同时, 美国工业企业的工会代表曾警告美国政府, 美国将退化为“汉堡摊位之国”。为击退这种“工业衰退论”, 1986 年, 美国政府通过了《税收改革法案》, 称“疲软的旧经济已被年轻有力的‘进步机车’取代, 它满载着新工作、更高的收入和机遇”。在这一时期, 美国人对未来的预测建立在关于危险与希望的争论之上, 已经偏离事实上发生的经济结构转型。类似的动态见于经济政策的许多方面, 权力结构和社会联盟的变化伴随着对未来的不同预测范式。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巩固旧产业与优待新产业之间的意见冲突充斥在税收、教育、劳动力市场、贸易、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市场竞争等诸多领域。

近十年里, 关于制造业未来的社会争议再次白热化。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 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开始质疑政府是否应该监管经济发展模式, 强制要求已有的工业结构适应技术变革是否在政府职权范围内, 政府是否应该这样做? 应在何种程度上将社会资源用于维持已有的工业结构? 为传统产业与新产业、新的经济领域建立联系创造空间, 有多大的必要性? 这些问题都引起了资本主义社会对未来经济增长模式的争论。

作者: 王悠然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 年 7 月 8 日第 003 版

美国“芯片法案”扰乱全球供应链

在美国总统拜登 8 月上旬签署了《2022 年芯片和科学法案》(“芯片法案”)后, 这项长达 1054 页, 授权金额高达 2800 亿美元的法案正式生效, 引发各界关注。海内外媒体、各界人士认为, “芯片法案”欲推动芯片制造“回流”美国本土, 又企图借此打压其他国家发展、维系美国霸权, 大搞经济胁迫。美国的意图和做法与市场规律和全球化潮流背道而驰, 将扰乱和破坏全球半导体供应链。

1 政府干预明显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原所长陈凤英研究员向《经济参考报》记者介绍, 法案的主要内容一是向美国芯片制造商提供 527 亿美元资金支持, 用以建厂生产等, 同时提供为期 4 年的减免 25% 税收政策; 二是拨款 5 亿美元用于国际间安全通信计划、拨款 2 亿美元用于工人培训等计划; 三是超过 2000 亿美元的预算, 将用于资助“研究与创新”,

如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量子计算等关键领域的投入；四是投入 100 亿美元在全国建立 20 个“区域技术中心”，投入数十亿美元促进基础研究及先进半导体制造能力等。

《华盛顿邮报》和《日本经济新闻》两大媒体作出评论，分别揭示了“芯片法案”的两大重要意图：一是通过巨额补贴和减税优惠吸引半导体企业在美国本土投资，二是设置补贴资格，即只要接受美国政府补贴，10 年内就不得在中国或任何其他“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特定国家”扩大先进制程芯片产能。

商务部研究院美洲大洋洲研究所研究员王立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芯片法案”专门融入了故意针对中国的单边干预手段，本质上是其长期对中国高科技迅速崛起的担忧，尽显美国高层越来越担心跨国企业在中国增加高端芯片产能，将造成美国失去全球高科技竞争绝对优势地位。

近年来，美国围绕芯片大做文章，一再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

陈凤英说，美国一直试图采用组建芯片联盟等方式遏制我国芯片产业发展。去年，美国还以提高芯片“供应链透明度”为由，要求台积电、三星等晶圆代工厂交出被视为商业机密的库存量、订单、销售记录等数据。

在王立看来，“芯片法案”的实质是希望在继续保持对华经贸高压态势的基础上，寻求在科技领域更直接高效压制中国的崛起，以在核心竞争领域拉开并保持中美代际差，确保其具有足够的经济与科技胁迫力量。

2 供应链被扰乱

欧洲最大的半导体生产商荷兰阿斯麦公司警告称，美国发布“芯片法案”是让企业在中美两国选边站队，将扰乱全球半导体供应链。

全球化已使芯片产业在全球建立起跨区域的产业链供应链网络，形成相互协作的高效格局。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21 年全球前十大半导体公司榜单上的六家美国公司的大部分生产制造都在海外完成。博通、高通及英伟达等芯片设计公司，基本依赖海外芯片代工厂来完成制造。英特尔、美光等虽保留了一部分芯片制造产能，但其外包代工业务量也逐年上升。

王立说，国际化分工体系协作和巨大的潜在市场需求是芯片技术飞速进步的必备要素。如今，中国在芯片产学研等领域也已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且作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单一市场，早已深深嵌入国际芯片产业链之中。

陈凤英分析说，中国和其他芯片生产商之间的产业链经过多年发展日趋复杂，内部生产网络密切程度日益提高。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张永军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芯片法案”实际上割裂了部分生产供应方和需求方，尤其是在高端芯片供需方面的联系，对全球芯片供应链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同时将打乱全球电子信息产业供应链，也不利于当前全球抑制通胀的努力。

“芯片法案”与要素优化配置的市场规律明显背道而驰。数十年来，美国芯片制造业不断向其他地区转移，主要是由于美国本土生产成本太高。据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披露，美国建设一家先进的芯片工厂并维持运营十年的成本比亚太经济体高出约 30%-50%。

半导体产业链转移需要人才、劳动力、物流、能源等一系列必要因素的支撑，多年没有布局半导体制造业的美国在上述领域都存在显著不足。台积电美国芯片工厂的建设就因为美国当地劳动力短缺、新冠确诊人数激增，以及获得所需不同类型建造许可证的复杂程序而被推迟。

“芯片法案”强迫相关企业“选边站队”，强迫全球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切割重组，势必将干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运行，已引起其他国家的关注。

韩国《韩民族日报》刊发社论直言，美国“芯片法案”的要求已达到侵害韩国经济主权的水平，严重损害两国互信。

美国《国会山报》也指出，美方如果强制进行产业转移或脱钩，必然导致全球分工出现混乱，加剧芯片供应紧张，进一步恶化美国自身面临的问题。

3 实施效果存疑

分析人士认为，法案对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破坏作用十分广泛。对“任何受关注的国家”界定宽泛，无限扩大了执法的自由裁量权，具有典型的泛政治化色彩，各国企业的经营活动面临的不确定性因此大大增加；规定要保证根据“美国制造”项目研发的技术在美国国内生产，不仅限制了部分国家企业公平参与全球竞争，也对全球经济复苏和创新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王立分析说，“芯片法案”此时出台，和美国为化解国内经济压力，将近两年面临的通货膨胀等一系列经济难题归咎于部分产业受损，归咎于高科技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关。

美国政府试图利用行政立法扰乱市场秩序，只会导致芯片生产成本上升，令消费者受伤，法案将给美国民众带来“更便宜的汽车，更便宜的电脑”的说法更是难以实现。

波士顿咨询公司等机构估计，如果美国采取对华“技术硬脱钩”政策，美国半导体企业受损更大，预计将使它们丧失 18% 的全球市场份额和 37% 的收入，并减少 1.5 万个至 4 万个高技能工作岗位。

美国芯片厂商也并未对法案感到欢欣鼓舞。即使是“芯片法案”的积极推动者英特尔，也不断游说，希望不要影响在中国的投资。

张永军表示，从业内人士反映看，芯片产业是一个投资强度很高的产业。从以往台积电、三星等发展芯片生产的情况看，美国试图用 2000 多亿规模资金来鼓励国内芯片产业发展，引导其他企业到美国投资的效果存疑。

分析人士认为，“芯片法案”最终的实施效果可能会因为国际、国内的分歧而大打折扣。

作者：周武英 熊茂伶

来源：《经济参考报》2022 年 8 月 26 日第 004 版

中欧班列开创国际物流运输合作新局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自开行以来，成为了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记者从8月18日召开的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过5.7万列，货值累计近3000亿美元，通达欧洲24个国家196个城市，运输服务网络覆盖了欧洲全境，开创了国际物流运输合作新局面，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优化运输组织，引导更多运输资源向开行质量好的企业和线路倾斜，进一步提升中欧班列运输附加值和盈利能力，进一步做大做强中欧班列，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

1 中欧班列成国际经贸合作重要桥梁

从2011年重庆至杜伊斯堡国际列车的“破冰之旅”，到成都、郑州、武汉、苏州、义乌等城市中欧班列的开行，再到2016年统一品牌正式启用，中欧班列进入统一规范、合作共赢、健康持续发展的新阶段。随着开行规模和质量的不断提升，中欧班列对沿线国家和地区务实合作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

“中欧班列已成为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桥梁。中欧班列应中欧投资贸易的不断扩大而产生，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而壮大，是我国与共建国家经贸联系最为紧密的路径。”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徐建平说。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过5.7万列，运送货物530万标箱，重箱率达98.3%，货值累计近3000亿美元。运输货物品类已由开行初期的手机、电脑等IT产品逐渐扩大到服装鞋帽、汽车及配件、粮食、葡萄酒、咖啡豆、木材等53大门类、5万多个品种，涵盖了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生活所需的方方面面。

与此同时，中欧班列已成为与沿线国家深化合作的重要载体，紧密了亚欧大陆的陆路联系。

截至今年7月底，中欧班列共铺画了82条运输线路，通达欧洲24个国家196个城市，逐步“连点成线”“织线成网”，运输服务网络覆盖了欧洲全境，形成了贯通欧亚大陆的国际运输大动脉。

“中欧班列的快速发展，有力推动了沿线国家之间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带动了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促进了亚欧大陆互联互通。”徐建平说。

2 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

中欧班列已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中欧班列安全稳定运行，实现逆势增长，成为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力量。

“中欧班列的开行，开辟了广大内陆地区开放发展的新通道。”徐建平说，例如，我国河南郑州、重庆等城市的外向型产业在中欧班列开行后，实现了年均30%左右的增长；新疆

依托中欧班列进一步增强了与周边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助推了新疆丝绸之路核心区高质量建设。波兰罗兹、德国杜伊斯堡等城市伴随中欧班列的发展,国际物流枢纽地位不断提升,当地生产的特色产品搭乘中欧班列大量销往中国。

受疫情影响,中欧班列更是成为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生命通道”。记者了解到,在海运空运受阻的情况下,国内中欧班列运营平台主动对接企业出口需求,与 TCL、戴尔、联想、吉利、沃尔沃等一大批企业合作开行了“定制班列”,为国内外企业维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2022 年以来,已累计开行“定制班列”1150 列,有效降低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冲击影响。

海关总署监管司副司长夏俊介绍,为有效弥补受疫情影响的国际航空和海运运力不足,进一步畅通国际邮件、跨境电商商品运输渠道,从前年以来,海关积极支持邮政公司、物流公司利用中欧班列疏运受疫情影响积压的进出境邮件、跨境电商商品。充分发挥中欧班列成本低、运费低等优势,吸引本土跨境电商商品通过中欧班列出境,为中小企业畅通物流通道、支持外贸平稳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

记者获悉,下一步,相关部门还将着力提升中欧班列开行质量效益,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胡亚东表示,当前,我国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助于推动中欧班列沿线经济发展,推动内外市场联通,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更为紧密。伴随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互联互通深入发展,从东南亚、中亚到欧洲,设施联通形成叠加效应,将为中欧班列提供更大空间、更优路径和更多发展机会。

徐建平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优化运输组织,大力拓展回程货源,促进运输资源集约高效利用。从运行效率、服务质量、创新能力、品牌文化等多方面丰富品牌内涵,进一步做大做强中欧班列,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坚持质量第一、效率优先,完善以质量效益为导向的中欧班列运行评价体系,引导更多运输资源向开行质量好的企业和线路倾斜。

此外,还将创新服务模式,完善多式联运服务,推进中欧班列与丝路海运、西部陆海新通道等联动发展,打造“精品班列”。充分挖掘沿线国家和地区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在条件成熟时,探索开行“旅游班列”。积极探索“运贸一体化”,进一步提升中欧班列运输附加值和盈利能力。

作者:汪子旭

来源:《经济参考报》2022 年 8 月 19 日第 002 版